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反贪通史

王春瑜 / 主编

貳

隋唐到明朝



辽宁教育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王春瑜 / 主编

中国反贪通史

贰
— 隋唐到明朝



辽宁教育出版社

第四章

隋唐时期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贪污

一、隋朝的贪污

公元580年，北周宣帝宇文赟暴殁，其子、静帝宇文阐年仅八岁，不能亲理政事，于是外戚杨坚在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等人的拥戴下，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然而杨坚的摄政却遭到北周宗室诸王和部分地方军政长官的坚决反对，相州总管尉迟迥首先发难，接着郢州总管司马消难和益州总管王谦也相继起兵。杨坚一方面以千金公主将嫁往突厥为借口，将分封在外的诸王召至京城加以监视；另一方面则利用三方叛乱各怀私心异志、缺乏协调的机会，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集中兵力打击尉迟迥及其盟友。经过几次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尉迟迥最终兵败自杀。不久，司马消难也因战败而逃往南方的陈朝，王谦则被梁睿擒斩于成都。在取得军事胜利后，杨坚又对北周宗室进行残酷清洗，几乎所有宗室子孙都被先后处死。

581年，杨坚废黜北周静帝宇文阐，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由此建立起隋朝。杨坚就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出兵占领位于今湖北省的傀儡国家后梁。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发兵五十余万，消灭以建康为都城的陈朝。至此，

南北分裂长达二百余年的中国，重新归于统一。

隋朝的建立不仅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而且还重新确立起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世袭政治特权则被进一步削弱。在这新旧政治体制交替的时代，作为专制政权痼疾之一的贪污腐败也以新的表现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隋文帝建立隋朝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先后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其中对中央机构的改革主要是废除北周模仿《周礼》设置的六官，改设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机构。三省即尚书省、门下省和内史省（后改为内书省），六部即尚书省下属的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为刑部）、度支（后改为民部）和工部。对地方机构的改革，主要是废除郡一级建置，只设州、县两级地方行政单位，同时取消州刺史任命僚属的权力，地方官吏全部由中央任命。隋文帝采取这些改革措施的目的是强化中央权力，革除大分裂时代的弊端。然而机构改革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在于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用人制度。在这方面，隋文帝沿用北周的做法，不再按照家族的世系和门第高下选拔人才，同时，为进一步削弱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还废除九品中正制，将选举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的吏部，并且开始试行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方式，那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用人制度的改革，从理论上讲，既可以加强中央的权力，又可以将更多的精英人才吸纳到官僚集团之中。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人才是政府所需要的精英，这就涉及任用官员的标准。由于隋文帝倾向于法家思想，因此他对儒家的政治道德和用人标准不以为然。他在仁寿元年（601年）下令关闭全国绝大多数学校的诏书中，就表露出对儒学培养政治人才的不满：“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隼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①正是由于认

^① 《隋书》卷二《高祖纪》。

为儒学培养的政治人才不堪任用，隋文帝才很少依据儒家提倡的任人唯贤的标准去选拔人才，他所任用的高级官员主要是政治上追随他的武将、文吏、同乡或亲属，其中多数人的籍贯是在关陇地区，地方官员则大多是武将。这既与隋文帝改革府兵制有关，也和当时“武夫参选，多授文职”^①的选举制度有直接联系。总的来看，由于隋文帝具有强烈的猜忌之心，加之他素无学术，以文法自矜，因此他对官吏的选用基本上只有两条主要标准：一是政治上的忠诚，二是具有办事能力。至于儒学所提倡的政治道德和政治才能，很少作为任用官员的标准。因此隋文帝时期的官吏，特别是中高级官员，或者是剽悍的武将，或者是熟悉行政事务的文官，大多擅长处理具体事务，但是普遍缺乏儒学所提倡的政治道德、廉洁自律。这种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者条件成熟，往往就要为追求私利而贪污受贿。

在隋文帝“入宫辅政”的过程中，郑译和刘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时的人形象地比喻为“刘昉牵前，郑译推后”^②。他们也因此受到隋文帝的重用，显赫一时。但是这两个北周宣帝的佞臣，一朝身居要职，便显露出贪婪的本性。郑译“性轻险，不亲职务，而赃货狼藉”，以至于“鬻狱卖官，沸腾盈耳”^③。刘昉则是“性粗疏，溺于财货，富商大贾朝夕盈门”^④。继郑译、刘昉之后，高颀、杨素、苏威、李德林又成为隋文帝时期最有权势的大臣。然而这四位权臣也是良莠不齐。高颀作为行政长官和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据说是一位公平正直的人。而隋文帝最信任的军事指挥官杨素，则是一个恃权骄横、贪财好利之徒，“负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碓并利田宅以千百数”^⑤。苏威是隋文帝的主要谋士，不仅具有野心，同时也相当贪婪，当时的人就认为，苏威诈为清俭，实则家累千金。曾经担任过内史令的李德林也是如此，他曾奏取叛臣高阿那肱在卫国县强夺民地

① 《通典》卷一四《选举二》。

② 《隋书》卷三八《刘昉传》。

③ 《隋书》卷三八《郑译传》。

④ 《隋书》卷三八《刘昉传》。

⑤ 《隋书》卷四八《杨素传》。

建造的市店，租赁收利，据说“此店收利如食千户”^①，后因隋文帝到晋阳视察，店人上表申诉，此事才被发觉。

隋文帝时期最有权势的大臣尚且如此溺于财货，其他地位较低的官员也就很难做到廉洁奉公了。尤其是一些军人，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牟取私利，特别突出。曾担任益州总管的梁睿本是北周旧臣，在平定前任益州总管王谦的叛乱后，威震西川。他自以为威名太盛，为了消除隋文帝对他的猜忌，“遂大受金贿以自秽。由是勋簿多以不实，诣朝堂称屈者，前后百数”^②。行军总管史万岁，在平定南宁夷爨翻之后，“爨翻阴有二心，不欲诣阙，因贿万岁以金宝，万岁于是舍翻而还。蜀王时在益州，知其受贿，遣使将索之。万岁闻而悉以所得金宝沉之于江，索无所获”^③。卢贲是隋文帝的开国元勋之一，曾负责宿卫，后因不满高颖、苏威共掌朝政，阴谋夺权而被废黜。当他再次被起用担任齐州刺史时，他利用粮食歉收、“民饥，谷米踊贵”^④的机会进行粮食投机。幽州总管燕荣，贪暴放纵，赃秽狼藉。营州总管韦艺，“大治产业，与北狄贸易，家资巨万，颇为清议所讥”^⑤。行军总管于仲文，在征讨江南高智惠等人的叛乱时，“三军乏食，米谷涌贵，仲文私糶军粮”^⑥。番州总管赵纳，贪婪残暴，大受赃贿，以致“诸俚僚多有亡叛”^⑦。青州总管张威，“颇治产业，遣家奴于民间鬻芦蕪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⑧。除武将之外，文官亦不乏贪赃枉法之徒，不过总的来看，隋文帝时期的文官似乎比武将更能洁身自好。

隋文帝时期，除了军事职务之外，多数州刺史也是由武将担任，而这些武将完全缺乏行政经验，因此普遍不称职，“暗于职务，政由群小，贿

① 《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② 《隋书》卷三七《梁睿传》。

③ 《隋书》卷五三《史万岁传》。

④ 《隋书》卷三八《卢贲传》。

⑤ 《隋书》卷四七《韦艺传》。

⑥ 《隋书》卷六〇《于仲文传》。

⑦ 《隋书》卷八〇《谯国夫人传》。

⑧ 《隋书》卷五五《张威传》。

赂公行，百姓吁嗟”^①。至于县令的任命，在取消州刺史自辟僚属的权力后，全部改由中央的吏部直接掌管。然而吏部在任用人才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李德林在反对设置乡正时曾经指出：“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诠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乃欲于一乡之内，选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难得。”^②正是由于任用的州刺史和县令多数都不称职，贪污受贿也就在所难免，这在一些偏远地区尤为突出。“岭南刺史、县令多贪鄙，蛮夷怨叛”^③。而乡正的设置，更是为贪污受贿开了方便之门。开皇十年（590年），虞庆则等人奉使巡省关东诸道后回到京城，就向隋文帝报告说：“乡正专理词讼，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不便于民。”^④

虽然隋文帝时期中央和地方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吏贪污受贿的现象，但因隋文帝本人极为节俭，对贪污腐化深恶痛绝，惩治贪官也非常严厉，因此多数官员，特别是中下级官吏，还有所顾忌，尚不敢肆无忌惮地进行贪污。然而到隋炀帝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开皇元年（581年）被封为晋王。隋文帝平定陈朝后，因江南发生高智慧等人的叛乱，杨广被任命为扬州总管，驻防江州（今江苏扬州）。其后，太子杨勇因生活不检点而引起皇后的不满，杨广乘机与其心腹策划阴谋，以促成太子的垮台。由于得到杨素的支持，杨广最终取代他的长兄成为皇太子。隋文帝死后，杨广即位，改元大业。他就是隋朝的末代皇帝隋炀帝。

隋炀帝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人。在文帝时期，他以生活节俭、不好声色而博得文帝夫妻的喜爱。开皇九年（589年），他作为平定陈朝的统帅，又因“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⑤。然而当他称帝之后，则一改往日

① 《隋书》卷六二《柳彧传》。

② 《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③ 《隋书》卷五五《侯莫陈颖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文帝开皇十年四月》。

⑤ 《隋书》卷三《炀帝纪》。

清心寡欲的面目，不断追求奢侈与豪华，从而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中骄奢淫逸的代表。大业元年（605年）五月，隋炀帝下令在洛阳西郊修建周围有二百里的西苑，“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山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官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竞以骰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①，同时开工的还有显仁宫，“南接阜涧，北跨洛滨。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②。同年八月，隋炀帝首次巡游江都，所乘龙舟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雀、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鳧、凌波、五楼、道场、玄坛、板舟翕、黄篋等数千艘，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十八万余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余人，谓之殿脚，皆以锦彩为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舳舻、八棹、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舆，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③。其后，又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江都之游，而其挥霍浪费，一点儿也不亚于第一次。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下令制作新的舆服，“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鼈髦者，皆责焉。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④，总计“役工十余万人，用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炀帝大业元年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炀帝大业元年三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炀帝大业元年八月》。

④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金银钱物巨亿计”^①。同年，他又下令天下的乐工子弟和擅长音乐的人全部集中在洛阳的西苑进行表演，“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彩为之空竭”^②。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率领大队人马北巡，为向突厥夸耀威仪和富庶，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亲自选定在汾州以北的汾水之源建造汾阳宫。据说隋炀帝虽然在两京和江都建有许多苑囿亭殿，但是久而生厌，于是亲自阅览天下的山川之图，选求胜地建造宫苑，汾阳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选定的。其后，隋炀帝又令毗陵郡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在郡城东南修建豪华的宫苑。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亲征吐谷浑，在经过大斗拔谷时突遇暴风雪，士卒冻死大半，马驴死者十之八九。大业六年（610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桥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绉绣。其营费钜亿万。关西以安德王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③。大业七年（611年）以后，隋炀帝又三次出兵征讨高丽，而其灾难性的后果最终激起民众的反叛。总的来说，喜好巡游，任性放纵，追求奢侈与豪华，是隋炀帝个人生活的突出特点。而为了满足个人欲望横征暴敛，无节制地滥用民力，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天下大溃，隋朝也就在遍及全国的反叛中覆灭。

隋炀帝与他父亲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使得在隋文帝时期被抑制的贪污腐化在整个官僚集团中不断扩大。隋炀帝最宠信的大臣中，宇文述“性贪鄙，知人有珍异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④。其子宇文文化及更是生性凶险，不循法度，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因不断受贿而被多次免官，但他仍不思

① 《隋书》卷六八《何稠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炀帝大业二年十二月》。

③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

④ 《隋书》卷六一《宇文述传》。

悔改，“见人子女狗马珍玩，必请托求之。常与屠贩者游，以规其利。炀帝即位，拜太仆少卿，益恃旧恩，贪冒尤甚”^①。与宇文述等人共掌朝政并专典机密的虞世基，在负责选拔官吏时“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②。其妻孙氏，“性骄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饰器物，无复素士之风。孙复携前夫子夏侯俨入世基舍，而顽鄙无赖，为其聚敛。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金宝盈积”^③。至于苏威、裴蕴、裴炬等人，“受诏参掌选事，多纳贿赂，士流嗟怨”^④。事实上，当时的中央官员绝大多数都有贪污受贿行为，“于时朝政渐乱浊，货贿公行，凡当枢要之职，无问贵贱，并家累千金。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⑤。

朝廷中的官员如此贪污受贿，地方官吏自然不甘落后，“于时政刑日紊，长吏多赃污”^⑥，一些原在隋文帝时期并无贪污行为的官吏，在此污浊的环境中也“颇改旧节，受纳货秽”^⑦。由于隋炀帝对内大兴土木，广建宫苑，巡游无度，对外穷兵黩武，三征高丽，因而赋役繁重，地方官吏也就乘机从中牟取私利，“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褒刻征敛，取办一时”^⑧。不仅长官如此，而且一般官吏也是利用职权，“因缘侵渔，百姓穷困，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⑨。

隋炀帝的横征暴敛，官吏肆无忌惮的贪污受贿，给整个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正如杨玄感在给樊子盖的书信中所说：“今上纂承宝历，宜固洪基，乃自绝于天，殄民败德。频年肆眚，盗贼于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为之凋尽。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鹰犬，禽兽皆离其毒。朋党相

① 《隋书》卷八五《宇文述及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炀帝大业二年七月》。

③ 《隋书》卷六七《虞世基传》。

④ 《旧唐书》卷六二《杨恭仁传》。

⑤ 《隋书》卷三九《阴寿附阴骨仪传》。

⑥ 《隋书》卷七一《陈孝意传》。

⑦ 《隋书》卷六五《王仁恭传》。

⑧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⑨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大业七年十二月》。

扇，货贿公行，纳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转输不息，徭役无期，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①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叛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大业七年（611年），山东王薄首倡义师。此后，各地风起云涌，义旗遍于大江南北，隋朝也就在义军的不断打击下土崩瓦解。

二、唐朝前期的贪污

隋炀帝骄奢淫逸的生活，劳民伤财地发动对高丽的征伐，不仅引起广大民众的反叛，同时也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大业十三年（617年），担任太原留守的唐国公李渊在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后，起兵反隋。他率领军队由太原南下，击溃隋将宋老生和屈突通的抵抗，迅速进入关中地区，攻占隋朝的都城长安，立隋炀帝年幼的孙子杨侑为傀儡皇帝，改元义宁。龟缩在江都的隋炀帝，则被遥奉为太上皇。

618年，江都发生兵变，隋炀帝被杀死。兵变的首领正是隋炀帝最信任的将领宇文述之子宇文文化及，他同时也是隋朝所取代的北周皇室后裔。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随即废黜傀儡皇帝杨侑，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唐，改元武德，由此建立起唐朝。李渊就是唐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唐朝建立后，唐军逐渐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武德七年（624年），盘据在今河北北部的高开道被部将张金树所杀，其地归于唐。据有江南之地的辅公祐也被荡平。至此，唐朝基本统一全国，唐高祖也为此大赦天下。

唐高祖完成了重新统一全国的大业，他损益隋代制度而重建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也为后来唐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但他在对付官吏的贪污腐化方面却未能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究其原因，首先是他委以重任的文臣似乎并不得力。唐高祖最宠信的大臣裴寂，原为隋炀帝的晋阳宫副监，与他私交甚好。据说当李渊的次子李世民暗中策划起兵反隋时，为获得父亲的支持，出私钱数百万贿赂裴寂，请他将此事转告李渊。裴寂受贿

^① 《隋书》卷七〇《杨玄感传》。

后，即劝说李渊起兵反隋，他也因此成为唐朝的开国元勋之一。入唐以后，裴寂受到唐高祖的重用，先后担任尚书右仆射、左仆射。然而裴寂是一个既胆怯又无能力的人，不仅带兵作战经常吃败仗，而且行政管理也相当糟糕，正如后来唐太宗李世民指责他所说：“计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信，特居第一。武德时，政刑纒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徒以旧情，不能极法。”^①唐高祖时期的另一位重臣是官至中书令的封伦。据说他很有行政才能，但他曾依附隋炀帝的宠臣虞世基，“密为指画，宣行诏命，谄顺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寝而不奏；决断刑法，多峻文深诬；策勋行赏，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日坏，皆伦所为也”^②。这样一个以其擅长的行政管理才能去败坏朝政的奸佞之徒，投降唐高祖之后，因献“密策”而被委以重任。但是封伦既无政治道德又十分虚伪，“外谨顺，居处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贿赂狼藉”^③。与封伦同时投降唐高祖的宇文士及是隋炀帝的女婿，也是杀死隋炀帝的宇文文化及之弟，他因其妹为唐高祖的昭仪而逐渐受到重用，官至侍中。虽然他为人谨密，但却保持着隋炀帝时期的遗风，喜好阿谀奉承人主，又热衷于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极奢侈”^④。这些聚集在唐高祖身边的隋朝旧臣，显然不可能去有效地抑制隋末以来甚为猖獗的贪污腐化之风。此外，唐高祖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归顺的隋朝官吏和豪强、武装集团首领，大肆进行赏赐，封官赐爵，并让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在其实际控制的地区担任军事或行政长官。由于封赏太滥，到唐高祖在位晚年，全国的州县数目已经是隋朝的两倍多。唐高祖的这种怀柔政策，有利于分化瓦解敌对势力，扩大自己的力量，从而加快全国统一的进程。然而，让大批隋朝官吏继续担任地方军政长官，却也不利于消除隋末地方官吏中盛行的贪污受贿。唐太宗认为他父亲在位期间，“政刑纒缪，官方弛紊”。这应当是符合当时实际

① 《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

② 《旧唐书》卷六三《封伦传》。

③ 《新唐书》卷一〇〇《封伦传》。

④ 《旧唐书》卷六三《宇文士及传》。

情况的。

唐高祖时期的贪污受贿，除了官吏非法牟取私利之外，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行贿受贿，也是相当的盛行。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战功显赫，声望日隆，权力不断扩大，从而威胁到长兄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太子李建成遂与三弟、齐王李元吉结成同盟，反对当时被封为秦王的李世民。唐高祖曾努力缓和太子与秦王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但在双方精心策划的阴谋影响下，他对两个儿子中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作为太子摇摆不定。为了获得父王的支持，削减对方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势力，对立双方都大肆进行政治贿赂。由于唐高祖易于偏听后宫嫔妃的闲言碎语，对皇亲国戚管束不严，太子与齐王便尽量讨好高祖的嫔妃并相互勾结，“复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侵夺犬马。同恶相济，掩蔽聪明，苟行己志，惟以甘言谀辞承候颜色”^①，同时“又厚贿中书令封伦，以为党助”^②。为了削弱秦王的力量，太子建成还以重金收买秦王府的将领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人。秦王李世民对太子与齐王的所作所为自然不会视若无睹，他一方面让妻子长孙氏周旋于高祖及其嫔妃之间，“尽力弥缝，以存内助”^③，另一方面则以恩信结纳自己麾下的骁将谋士，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同时还派秦府的车骑将军张亮等人到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④。此外，秦王李世民也对一些重要人物进行收买，其中被贿买的驻防玄武门的禁军将领常何，在后来李世民杀死太子和齐王的玄武门之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类因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贿赂和收买，在唐高祖时期太子与秦王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

唐高祖两个儿子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最终演变为兵戎相见。武德九年（627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兵变，在皇宫进出口的玄武门设

① 《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② 《旧唐书》卷六四《巢王元吉传》。

③ 《旧唐书》卷五一《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六月》。

伏，袭杀长兄建成、三弟元吉。事隔三天，李世民就被立为皇太子。两个月以后，唐高祖又被迫将皇位传给太子，自己则成为毫无权力的太上皇，在太安宫内默默无闻地生活了九年，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去世。

继唐高祖之后称帝的李世民，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他在即位初期，以隋朝的覆亡为鉴戒，关心民众疾苦，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同时他还认为，官吏的良莠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为此，他逐渐罢免高祖时期无能的大臣，斥退大多数担任高级官员的皇亲国戚，起用有才能的人担任重要职务，而不去计较他们过去的经历和政治背景，并且也不对有才能的人求全责备。他认为：“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屈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榑。无屈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① 这种唯才是用的择官思想，唐太宗曾对他最信任的大臣长孙无忌说得再明白不过：“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适，虽怨讎而不弃，魏徵等是也。朕若以无忌居后兄之爱，当多遗子女金帛，何须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② 正因为如此，唐太宗在他的身边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戴胄、李靖等人。除朝廷重臣之外，唐太宗对地方官的任用也非常重视。他曾对待臣说：“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唯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③ 对地方官吏，唐太宗认为除了才能之外，还应注意他们的德行：“比见吏部择人，唯取其言辞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④ 为此，他一方面对

① 《帝范》卷二。

② 《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

③ 《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

④ 《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

现任地方官不断进行大规模考察，其中贞观二十年（646年）的考察，刺史县令以下的地方官，上千人因政绩不佳而受到惩处，七人因犯罪被处死，二十人受到提拔；另一方面，他不断亲自过问刺史的人选，下令中央官员推荐新人担任县令。同时，唐太宗还提倡儒学，扩大科举，培养和选拔具有儒家思想的人才。通过不懈的努力，太宗时期的各级官吏，总的来看，绝大多数都能遵循法纪、廉洁自律，其间虽然也有一些官吏贪污受贿，但始终只是个别现象。吴兢在《贞观政要》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说，太宗自即位之始，“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学，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深恶官人贪浊，有枉法贪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滑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唐太宗在位期间，可以说是整个隋唐时期政治最清明、贪污腐化最为收敛的时期。

唐太宗晚年，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爆发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结果太子承乾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也遭废黜，太宗第九子、年幼的晋王李治在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和李世勣等大臣的有力支持下成为皇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去世，李治便继位为皇帝，是为唐高宗。

唐高宗即位初期，在太宗为他精心安排的顾命大臣辅佐下，继续执行唐太宗时期的政策，提倡节约，关心百姓疾苦，抑制贪污腐化，因此被认为有贞观遗风。然而唐高宗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即使在他即位的初期，官吏的贪污受贿也有所抬头。永徽元年（650年），中书令褚遂良强行压价购买一位下属翻译的田地。这件事在当时就被认为具有以权谋私的性质。一些皇族成员也开始明目张胆地敛聚财产，其中滕王李元婴和蒋王李恽最为突出。而当时的官吏在处理公务时，往往也要互相关照，不能秉公办事。高宗为此向宰相征求处理意见，作为顾命大臣的长孙无忌却回答说：“此岂敢言无，然肆情曲法，实亦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

亦不能免。”^① 曾经是唐太宗最亲信大臣的长孙无忌，此时可能已经忘记了太宗谆谆教导的防微杜渐。以后，随着大权逐渐落入武曌的手中，政治相对清明的时代便归于结束，官吏的贪污腐化又开始猖獗起来。

武曌是唐朝开国功臣武士彟的女儿，唐太宗将她召入宫内，立为才人。高宗即位后，又将她立为昭仪。不久，武曌就为高宗生儿育女，而高宗的王皇后却始终没有生育。武曌为了取代王皇后的地位，施展一系列阴谋诡计，甚至不惜亲自扼杀自己的女儿以诬陷王皇后。在武曌的蛊惑下，高宗决定立武曌为皇后。为了得到大臣的支持，高宗首先去争取长孙无忌，为此封长孙无忌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和武曌带着十车金宝缯锦去见他，希望能够以此得到他的赞同。长孙无忌收取了贿赂，却不支持立武曌为皇后。另一位顾命大臣褚遂良也坚决反对废黜王皇后。在这种情况下，武曌转而寻求中级官员的支持，以便与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相抗衡。于是李义府、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王德俭和侯善业等人，先后投靠武曌，朝臣也因此分为对立的两派。由于得到高宗的坚决支持，武曌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为皇后，多数反对武曌的大臣先后遭到清洗和贬斥，而支持武曌的官员则大多升官晋爵，并成为支持武曌掌权的政治势力。然而这些拥立武曌的官员，当 they 与武曌互为表里、把持朝政以后，便有恃无恐地胡作非为，贪污受贿也就在他们之中盛行起来，其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许敬宗与李义府两位宰相。

许敬宗出身于杭州新城县，是隋朝的秀才，以擅长文学著称，唐太宗时期曾参加国史和实录的编修工作，高宗即位后，因赞成立武曌为皇后，又参与诬陷长孙无忌等大臣，于是被越级提拔为宰相，并负责编修国史。事实证明，许敬宗是一个腐败的宰相。他不仅好色无度，而且为子女择婚也是唯财是求。他因贪图钱财，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儿子。为此他曾遭到弹劾，并且被贬为郑州刺史。可是许敬宗并未以此为戒，以后嫁女娶妇仍然是贪婪地索取财贿。他在编修国史的过程中，同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二年九月》。

样收受贿赂，记事阿曲，“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①。

不过许敬宗与同为武曌死党的李义府相比较，在贪赃枉法方面又显得是小巫见大巫。李义府出身于梓州永泰县，唐太宗时期以善于属文，对策擢第，屡迁至太子舍人，高宗嗣位，迁中书舍人，后因依附武曌而被提升为宰相。李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②。“笑里藏刀”这个成语就是由此而来。李义府当上宰相后，依仗武曌的支持，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无所不为，“诸子孩抱者，并列清贵。而义府贪冒无厌，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爵，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③。当高宗风闻李义府一家人专以卖官为事，铨序失次，人多怨黠，遂“从容诫义府云：‘闻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勗，勿令如此。’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曰：‘谁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腕然，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亦优容之”^④。如此昏庸的皇帝，如此跋扈的宰相，由此产生的政治腐败，以及伴随政治腐败而大量出现的贪污受贿，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武曌粉碎了上官仪等人企图将她废黜的阴谋，大批朝臣遭到清洗。此后，武曌完全控制了朝政，“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⑤。唐高宗死后，大权在握的武

① 《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

②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高宗显庆三年十月》。

④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⑤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麟德元年十月》。